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元末明初 松江文人群体研究



崔志伟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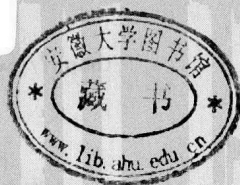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元末明初 松江文人群体研究



崔恣伟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崔志伟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 4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忻平主编)
ISBN 978-7-5671-0252-1

I. ①元… II. ①崔… III. ①文学流派—研究—上海
市—元代~明代 IV. ①I20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3042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封面设计: 张天志

版式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

崔志伟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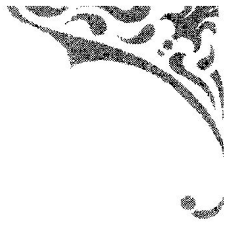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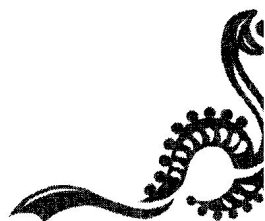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47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0252-1/I·174 定价: 68.00 元



本研究受上海大学“211 工程”
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
(A.15 - A011 - 09 - 001) 资助，谨致感谢！



总 序

忻 平

一

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上海大学“211 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课题的部分成果。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生态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及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共同关心的领域,它吸引了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研究多集中在精英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讨论上,近年来对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也已开始多起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国家/社会、主流/边缘等多种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交融竞争,使民间文化生态更趋复杂,也引发以“信仰/价值的缺失与重构”为核心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求研究视野更多地从上层转向下层,从官方转向民间。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变化趋势之一。民间社会的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理与总结,其社会转型中引发出的问题,也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前提下谋求解决之道。

以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了漫长的社会转型。不仅史学界以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人文社科各学科也以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为重大问题。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已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有更确切的含义,包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等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型。

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当代社会转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如



今中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不应回避的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学者作出了“社会溃败”的悲观判断。中国发展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发展走向也是合理的。然腐败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也已充分暴露。可以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时期。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努力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文化自身的状况及其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实际事关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它诞生初期主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其后开始关注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并认为这种关联性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因此文化生态被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不容乐观,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不断地吞噬着地方的传统文化,威胁到文化的多样性。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导致文化受到污染。通俗文化的强势和精英文化的缺失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匮乏,只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从而造成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信仰失落等一系列负面后果。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必须修复文化生态的平衡。这既要靠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又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实现全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文化自觉,从而达到文化生态的和谐。

人文基础学科有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本项目从城乡社会生活、文化生产、信仰与价值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研究“转型

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通过科学地认识转型期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间文化生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知识基础、话语体系和决策参考。

城乡生活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基础,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关心的前沿问题。本领域的研究结合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演变。但已有的相关成果多集中在古代及大城市研究上,对近代转型期的城乡社会生活的比较及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生态的互动关注明显不够。这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城乡社会生活变迁引发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急剧变革的现实是不对称的。有鉴于此,我们将“近现代城乡生活与文化生态”列为本项目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以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如何改造与重建城乡文化生态为出发点,研究城乡生活与中西文化、乡土文化与民间精神、方言与地域文化,通过研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代谢,揭示其中传统与现代因素、本土与外来因素的衔接、冲突与竞争,试图找出影响构建适应经济基础的文化生态中的核心问题与应对之策。

对中国民间文化生态得以生成、运行与传播的文化生产机制的分析,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对文化生产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马克思。国外学者韦伯、阿多诺、鲍德里亚等纷纷从现代性、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等多种维度展开了对文化及其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国内有关文化生产机制的提法最早由王晓明教授提出,将生产机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探讨中国当代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及其历史条件和资源,将有力地推动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因此我们将“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及国家策略”列为本项目的另一个方向。该方向关注当代日常生活文化、文化传播机制、文化观念/意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分析和现代早期的思想与文化等内容,研究正在形成的文化状况及其生产机制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参与新的文化现实的构建。

信仰多样性及其认同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合理构建的核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渗透与竞争产生了民间的信仰多样性的局面,使得信仰及其认同的探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分析民间文化生态中信仰多样性的现状及原因,将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寻

求和建设民间社会共同价值认同和国家对信仰问题的有效治理与引导。因此我们将“信仰多样性的民间认同与政府管理”作为本项目的第三个方向。该方向从宗教信仰与民间社会认同、当代宗教与社会转型、知识及价值与主流信仰等问题研究入手,探讨转型期社会信仰多样性及民间社会基本价值认同的状况及变化,为和谐社会下民间信仰体系建设提供知识和决策参考。

二

自近代以来,上海在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海内外学者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学界对它的重视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上海学”的概念,用以强化上海研究的学术和学科意义。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地方高校,早在80年代便向本科生开设了“上海学”课程。本项目课题团队依托上海大学的这一传统优势,将上海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经过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得以出版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概言之,本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其时间脉络的完整性。本丛书的关注点从上海文明的古老源头一路延伸到当代。张童心近年对上海及其周边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他参与主持的广富林遗址最新考古发掘,将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史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崔志伟的《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对元明之际松江文人群体的来源、交游、政权更替下的文人心态、文人创作题材与形式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刘蕾从归有光与嘉定文坛关系入手,展示了归有光在嘉定文坛地位的确立及思想的传承过程,探究了明清之际归有光文坛地位发生转变的原因。忻平的《危机与应对:1929—1933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一书把视线拉到近代。通过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下上海市民各阶层群体和组织、不同领域和生活方式的多维考察,展现了危机时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及民间应对方式。王光东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上海写作》一书,以张资平、茅盾、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为个案,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上海的想象方式以及产生的原因,阐明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及其内在关系。王晓明的《今日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九十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则进一步将目光

定格在当下的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考察它与都市青年日常生活的关联。

第二是关注民间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的日常性。陶飞亚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上海世俗生活》便从历史的移动中展现基督教宗教东来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这样一个见微知著的历史命题。王晓明对当前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也是从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忻平主编的《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更是展现了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诸多面相。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性。多学科意味着多种学术探讨的方法,本套丛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涵盖了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学科视角,更对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借鉴。如蔡翔和董丽敏等著的《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一书,就是运用了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从空间和媒介两个视角,考察上海文学叙事过程文化观念形成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和文化关系的重构,分析由此形成的上海符号和符号体系。

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直接针对性。本丛书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上海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新的探索。曾军等著的《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集中反映了这一关怀和努力。此书意在以上海为方法,去充分展示“中国模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深刻揭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同时通过反思性、批判性的维度,来探索一种上海作为综合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本书构思宏大,内容丰富,囊括了上海与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上海与中国城市精神建构、上海与中国城市建筑美学、上海与中国城市改造运动、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化记忆、上海与中国文化制度变迁以及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

第五是学术关怀的当代性,即注重当代上海的最新变化及发展趋势。吕建昌的《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从文博事业的角度审视历史上世博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进而扩展到世博会对城市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影响,博物馆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世博后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走向等问题。本书提出了上海世博会后续“文化效应”的概念,为全面、客观评估世博会对举办地所产生的总体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雷洪波的《移民视角下的上海城市语言接触》是对当前上海正在发生的语言接触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旨在通过描述当前城市背景下移民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态度等相关问题,从语言接触中的另一方——移民的角度出发,反映语

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现实。王天恩的《历史逻辑与主流信仰——以上海市情为背景》从哲学的层面对当前上海的主流信仰进行了剖析,无疑也体现了本团队强烈的现实关怀。

丛书的作者,既有资深学者,又有青年新锐。丛书得以付梓出版,是多年来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作为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感谢大家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很高兴承担这个编辑工作,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推介给广大读者。由于时间仓促,丛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序

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文学和文化，是一个值得今人深入探讨的课题。

早在2005年8月，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当时刚刚推出的《上海文学通史》举办“上海文学特色研讨会”，与会专家就书中不少问题展开争辩。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上海究竟有没有古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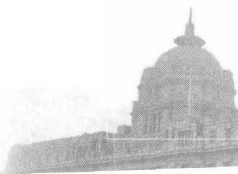
质疑一方认为，上海是否存在“古代文学史”值得怀疑，仅凭一些诗词就断定上海存在“古代文学史”，“很难有说服力”。他们认为上海文学的高潮只是出现在晚清和民国一百年中，认为上海古代文学缺乏独立性格和较大影响，明代末年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以前的上海文学，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肯定一方以上海大学董乃斌先生和上海社科院陈伯海先生为代表。董乃斌认为，“上海的文学史”应该以“地域”为标准，虽然上海建制较晚，被称作“上海”也只有几百年历史，但“上海这片土地是一直存在着的，在此地域内的作家理所当然应该收入这部《上海文学史》”。陈伯海也认为上海古代文学确实存在，“它只不过处于吴文化的边缘。上海文学从古至今，其实就是一部从吴文化边缘走向吴文化中心的历史”^①。

肯定者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早就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近代海派文学文化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之所以发生于上海，首先是因为这里具有合适的土壤；或者更明确地说，近代的上海文学和上海文化，绝非纯粹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但是，因为长期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例如古代各个时期的上海地

① 详见2005年8月10日《文汇报》、《青年报》、《新闻午报》及11日《解放日报》相关报道。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两种宇宙观》，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7页。



区,究竟有哪些土著的和外来的文学人物在这里活动?他们怎样开展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成就如何?影响怎样?他们和近现代海派文学文化的或隐或明的联系何在?凡此种种,我们都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没能梳理出线索加以阐述,所以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海派文学和海派文化,只能是属于近代上海的。事实上,早在上海开埠数百年以前,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各种机缘巧合(经济、政治、社会因素),这块土地上已经具有了后来海派文学文化的不少特点。今天崔志伟同志选择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群体开展研究,其实也就是试图回答上述质疑者的疑问,即古代上海是否出现过具有独立性格和较大影响的、具有海派特点的文人群体及其文学。

首先是元末明初松江文学人物的挖掘和文学史料的搜罗。元代后期的松江地区名人云集,既有外乡移居此地的文艺名家黄公望、倪瓒、杨维禎、陶宗仪,也有不少当地知名的文化人,如松江的曹知白、夏文彦、袁凯、朱芾、谢伯理,崇明的秦约等等。然而其中不少人没有别集传世,有关他们的诗文创作、文学交游等等资料,分散于书画著录、笔记总集、石刻碑铭、地方志等等,需要广泛搜集和认真梳理。

其次是有关当时当地文艺活动、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特色的钩稽、分析和总结。例如元末赖良在松江等地搜辑的《大雅集》,其出版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当地的文化传播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元季松江吕良佐出资发起的文会,究竟有哪些人参加?这种文会组织,对于当时松江地区的文章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地年轻人为何群起追随铁崖,学习诗文创作,其诗文创作理念如何发生变化?铁崖派的海派文化因子是怎样形成的?张士诚时期松江地区的文学活动与朱元璋时期有哪些不同?明初松江文人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具体变化,以及促成这种变化的各种原因等等,都是需要尽可能地去寻求答案的。

最后,分析和总结这一时期松江地区有别于吴文化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特色。

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上述探求并未能够完全获得答案。但是通过崔志伟同志细致努力地梳理,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元代的松江地区,确实已经产生了不少类似近现代上海文学文化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发生和形成,与松江的地理位置直接有关,也与元代的制度、经济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上海靠海,古人习惯称之为“海上”,但如若不开发利用海洋,上海其实不会有多大影响。松江和松江周围地区之所以在元代受到众人关注,是因为元代政府对

于海洋的利用,在古代社会大概是空前绝后的。尤其是一度不用漕运而改为海运的措施,带动了东南沿海许多中小城镇的经济,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就有昆山、太仓和松江。经济一旦发达,就引来大量移民。近现代上海的移民文化的许多特点,在元代因此有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人们常说近代上海是天下闻名的移民社会。其实早在元代,各路移民已经纷至沓来,在上海地区安营扎寨,并且发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

当时移民文人与当地土著文人的文学交流和文艺活动,十分频繁。元四大画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都曾在这一带活动。浙江台州的李孝光、诸暨的王冕、黄岩的陶宗仪,也曾来过这里,而且都受到很好的待遇,这都体现了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特点。

我们常说海派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其包容性。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特点,使得它能接纳许多内陆文化所不能容忍的东西,比如俗语常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但是当时松江以及周围地区的“地头蛇”不但不压制外来的“强龙”,还常常将“强龙”奉为座上宾。元代中后期许多浙东文人来到浙西,就像 20 世纪到上海来闯世界的“宁波帮”,但是当时的浙东文人比后来的“宁波帮”更为幸运。松江的有钱人不但将他们奉为座上宾,请他们做教书先生,还筹款出资供他们出版书籍。杨维禎元末辞官后没有选择叶落归根,明初天下安定后仍然没有回返家乡浙东诸暨,说明他在这里生活没有隔膜,感觉很舒适。当时的松江、昆山等浙西城镇对于外乡文人的包容和欢迎,相当普遍。否则,杨维禎、郑元祐、陶宗仪、王逢等许许多多的外乡文人不可能长期拖家带口在此生活;陶宗仪也不可能在耕作之余,编撰出《南村辍耕录》、《书史会要》、《说郛》等大量著作。

海派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在建筑形式和娱乐方式的表现上尤其突出。元代松江的建筑形式五花八门,诸如兀立高耸的“吕氏真赏楼”、四面赏景的“不碍云山楼”,酷似蒙古包的“纯白窝”等等;娱乐方式甚或兼有异域风情,例如十六天魔舞;就连现代海派为人所诟病的标志性特点——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当时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表现。^① 凡此种种,说明当时以杨维禎为代表的移民文人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而松江一带的当地人的思想意识较为开放。这一切,与元代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有关,与松江等地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影响也不能说没有

^① 沈从文:《论“海派”》、《关于“海派”》,《沈从文全集》第 17 卷《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关系,否则类似蒙古包的住宅形式,绝不可能出现于东海之滨。总而言之,历史上的移民对于松江以及周围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值得深入探索,仅仅关注近代移民现象显然是不够的。

松江当地居民对于外乡文人何以如此宽容和包容呢?主要是因为元代疆域辽阔,人口流动较以往更为频繁,而松江、昆山、太仓等浙西中小城镇的经济,当时发展很快,在元代已经成为各地移民纷纷驻足定居的繁盛地区。新兴的五方杂处社会中的土著居民,乡邦意识相对比较淡漠,很少有排外心理;附庸风雅和仰慕文才的传统心态,又促使他们能够利用或创造一切条件,礼待外乡文人。由此而反映出来的松江以及周围城镇市民文化上的兼收和心态上的包容,其范围和强度都超越以往任何时代,例如昆山顾瑛,始终将杨维禎作为贵客对待,不仅主动出资为铁崖出版诗集,而且不要求任何形式(或名誉或利益)的回报。这样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比较少见。

说到昆山顾瑛,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有关研究范畴的界定问题。顾瑛的所作所为,包括生活态度和文艺思想都与元代的松江文人十分相似,与杨维禎(包括松江文人)生活方面和文艺方面的联系也十分紧密。但是顾瑛并非松江人士,而是邻近的昆山人,既然是探讨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因此只能将顾瑛(以及许多具有海派特色的元代昆山、太仓文人)弃之不顾。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当初我们的考虑有欠周详。既然是为海派文化寻根,就不能拘泥于今天的、甚至当时的行政区划,而是应该从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的角度着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接纳所有与海派文化相关的人物史料,也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探寻理清古代上海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轨迹。

松江(包括上海县)在很长时期里,只是吴文化区域里的一个点,只不过这个点后来逐渐壮大了。元代的松江府,和周边如今属于江浙的一些城镇,不管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文化的特点,当时差别并不大,而且联系相当紧密。就以昆山来说,现在属于江苏省,但在当时与松江、上海的情况却十分相似,联系也十分密切。松江府的前身华亭县建于唐朝,就是从嘉兴、海盐、昆山三县分割的土地,而在元末战乱时期,从江浙行省省会城市杭州到昆山,走海路绕道松江,曾经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

昆山、太仓、松江、上海,这些地理位置相近、文化氛围相同的城镇,长期以来同

属于吴文化的范畴。即使开埠繁华之后,很长时期里上海还是被称作“小苏州”,所以必须承认古代上海长期以来只是吴文化范畴中的一个点。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吴文化即吴地文化,包含区域很大,沿海或经商口岸,和苏州、无锡等城镇就有所不同,文化也有差异,比如同样是包容,力度却有强弱之分。元代的松江、嘉兴、海盐、昆山、太仓等东南沿海城镇,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太仓、昆山一带和松江、上海的地理环境类似,当时昆山、太仓直通海船,与海外商人的接触十分频繁,因此移民文化的氛围与松江、上海也十分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昆山富户顾瑛对待杨维禎,和松江大户吕良佐的态度是一样的,而且因为他财力雄厚,嗜好风雅,当时的影响要大得多。杨维禎第一部诗集《铁崖先生古乐府》,就是因为顾瑛的慷慨解囊才获得出版。

因此,探讨古代的海派文学,仅仅关注松江地区是不够的。结合地理、经济、文化因素,来考察古代上海以及周围城镇文化的影响力及其变化,才能看到它阶段性的、逐渐的发展和演变,如此为海派文化寻根,也才能更为客观。也就是说,崔志伟同志有关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的探讨,单纯就海派文学的寻根而言,也还只是开了一个头,接下来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重新审视崔志伟同志对于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的探讨,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研究古代松江的文人、文学和文化,是为近代海派文学文化寻根。疆域辽阔的大元王朝,为南北交流、海外经商提供了方便,海运更是直接促进了当地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使得当时当地文人的人际交往、社会理想和创作理念,往往有异于前辈文人,和其他吴文化地区的文人也不完全一致。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及其文学,确实具有自身独立的特点和影响,那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甚至有别于吴文化其他地区而与现代的海派文学文化相通的特点。

第二,研究上海的古代文学和文化,不能撇开当时联系十分密切、地理经济文化环境都十分相近的地区,不能过于强调今天的行政区划内的上海古代文学的独特性和影响力,要看到它阶段性的历史发展、变迁和逐渐的影响。

第三,古代上海只是一个县,松江也仅仅只是一个府,既非政治中心,也非经济中心,其土地面积无法与现代上海相比,其影响力在开埠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有限。其实要说上海发生真正的大范围影响,时间很晚,长期以来上海属于以苏

州为中心的吴文化范畴,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仍称“小苏州”,被称为“大上海”,一百年都不到,因此绝不能过分夸大古代海派文学文化的作用和魅力。

过分夸大固然不对,“忽略不计”的态度更不可取。上海独立的经济、文化特点,显然不是到 20 世纪才突然产生的,古代上海确确实实从吴文化的边缘逐渐走向了吴文化的中心。一路走来的历史漫长而曲折,期间既有高潮,也有衰歇。崔志伟同志称“元末松江是海派文化、移民文学的发祥地”,可见她认为海派文化、移民文学在元代已经崭露头角。换言之,海派文学文化的根是土生土长的,古代上海能够从吴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并非完全是因为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后的开埠。那么,曾经的高潮为何转眼又消歇了呢?我们所从事的上海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就应该致力于考察诸如此类的变化轨迹及其成因。总结其中的因果关系、利弊得失,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想必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这部书稿,凝聚着作者许多心血。当然,书稿并非完美,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求,除了以上提到的松江邻近城镇地区文人文学文化的拓展研究,就是本书稿探求的主体——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及其作品,也还有进一步细致深入的空间和必要。希望书稿的出版,能够成为崔志伟继续其学术探求的动力。对此我有殷切的期待。是为序。

孙小力



绪 论

有元一朝作为一个充满异域色彩的王朝,与以往的汉族统治不同,崇尚“功利”,进而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注入全新的血液。海运与鼓励商业政策的实行,使元末东南沿海一带工商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加之元末群雄割据的动荡时局、明初残酷压迫的政治统治,更加速了文人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人格力量、价值取向以及处世态度的新变。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它大致始于元顺帝至正初年^①,迄于明洪武末年甚至永乐初年,约六、七十年之久。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的松江文学加以研究,一方面是因为通常的古代文学史的分期,都根据封建王朝的更迭划分,更多地强调不同朝代的政治色彩,因而忽视了文学文化的传承延续其实是滞后于政治时局的变化的,忽视了文学本身存在的多元性与时空的包容性,以及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之下,所产生的种种“非当代”的思想和作品。另一方面,元末明初松江一带的文坛,曾经绚烂,曾经消沉,经历过丰富多样的变化。分析解剖这一时段、这一地区的文化和文学,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元明文学和地域文学。

试举一例:从永乐十一年(1413)浙江浦江黄容所撰的《江雨轩诗序》,就可以看出,元末诗风在明初的延续长达数十年。

《江雨轩诗序》是黄容为昆山老儒偶桓诗集所撰的序文。文中追溯自古以来诗歌风格的各种变化,认为偶桓诗歌的命题造语皆“平易和正”,犹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陈师道、朱熹的诗歌,“一本于理”,符合诗之“古法”;作为偶桓诗歌的对立面,则是“凌厉险怪”、“巧中物情”的杨维禎、高启的诗歌。他指责杨、高二人的诗歌就像唐代李贺、孟郊、贾岛、元稹、白居易一样,自恃才气甚高,“穷思远索,务求人所未

^① 以“至正初年”为起始,是因为元顺帝执政初期为丞相伯颜所控,直到至正初年才真正掌权,采用新政,并开始重用南方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文化的活跃和文学的发展。

